

# 顾颉刚疑古史学的现代价值

李振宏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以来,学界毁誉之,已经有很多论辩。有胡适、郭沫若等人的明确肯定,有冯友兰从信古、疑古、释古的认识论阐释,更有九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打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大旗,宣布“疑古”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历史时代<sup>①</sup>。关于古史辨派的研究,多是积聚在这些说法的旗帜下,评价其辨别伪书、史实的功绩或缺失,评价其方法论问题;但这些评价多是将其放在具体的事实性层面上,而对其在学术精神层面的评价,从更高的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角度的评价,尚嫌不足。

从今天的学术时代出发,对古史辨的评价,需要跳出史书辨伪和史实考订的框框,甚至方法论的框框,而侧重从学术精神、学术态度、学术理念以及学术功能和使命的高度,对之作出新的考察。林沅先生在十多年前批评“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时说过一句话:“走进疑古时代就很好,不用走出来的。”<sup>[1]</sup>这句话讲得很好,很深刻,值得认真体味。

为什么“不用走出来”呢?以笔者之见,走出来就不是学术了,就失去学术的品格了。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怀疑与批判,没有疑问、质疑、否定、批判,就不会有学术的发展。所以,如何对待“疑古”的问题,关乎着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顾颉刚疑古史学带给中国学术的,就是以怀疑和批判为表征的学术的现代性。

现代学术是相对于传统学术而言的。

在中国,传统学术的主体是经学。从纯粹学术的角度说,经学的本质是其非批判性。经学的精神本质是建树精神权威和培养精神奴隶,经学的学术特征是通过传注而传承,传道、授业、解惑是这种学术的基本传延途径,与现代学术通过质疑、批判、否定、否定之否定而发展的路径截然不同。没有批判和否定,就没有学术的发展,而经学的发展就完全不依赖于批判和否定,相反,它的最根本的特征则是拒绝批判。

现代学术精神的内核是“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学术的发展。这是就学术之所以为学术而言。就现代学术的功能而言,也是“批判”二字。落实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历史学的领域,学术的使命就是执行社会批判。

马克思说他的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sup>[2]</sup>(P112)。多年来,笔者是凭着从马克思那里受到的启发,去理解现代学术之本质的。无论是从学术的属性上看,还是从学术发展的动力因素说,抑或是讨论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或使命,笔者所强调的都是“批判”二字。上世纪九十年代,在给蒋大椿先生写的一篇评论中,笔者第一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社会科学的主要使命之一是执行社会批判,即通过对重大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分析批判,去推动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进步。历史科学也不例外。”<sup>[3]</sup>

<sup>①</sup> 胡适认为,“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古史辨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4、338页)。郭沫若则说:“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见……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为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305页)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说法,就更为大家所熟知了。

2009年《学术月刊》第12期发表关于本人的学术访谈,访谈的标题就定为《让学术执行批判的使命》。2011年,笔者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题为《论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的文章,结尾处写道:

社会需要批判,任何社会的任何时代都需要批判。因为,任何时代的社会发展,都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人类永远需要为自己开辟新的前景。正因为这样,不断对自己的创造活动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利于进一步的发展,就成为历史向人类自身提出的一个庄严的要求。社会科学就是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

从思想学说的角度说,没有任何一种学说是绝对的终极真理,不应该接受分析、质疑和批判;从社会或政治上说,没有任何社会或政治的现实状态,是最完美的理想状态,不应该接受来自社会成员的思考和批判。而正是人们持续不断的分析思考、质疑批判,才可能促使一种学说或政治逐渐地臻于完善。思想的和社会的批判,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动力和活力。

这些是笔者从本质的意义上对学术或者说现代学术的理解。批判性,是学术之成为学术的基本特征。而顾颉刚的疑古史学,高举的恰恰就是这样一面批判的旗帜。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的经历详细一说。这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sup>[4]</sup>(P60)这在学术史上不只是一个破天荒的发现,一下子击溃了传延千年的古史系统,否定了传说中的古史的真实性,可信性;更重要的是,他由此揭起一

面怀疑、否定、批判古史观念的大旗,将史学研究从征信一变而为质疑,改变了学术的致思方向,并由于其鲜明而强大的方法论属性,迅速造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开辟出近代史学的发展路径<sup>①</sup>。

由于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所推动,顾颉刚很快就在写作《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四个月后,在思想的场域中攻城略地,扩大地盘,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发展为一个古史批判的思想系统。这就是他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sup>[4]</sup>(P99-101)。

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这种单纯的古史辨伪目的,到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从辨别古史书到打破陈陈相因的古史观念,贯彻其中的就是怀疑与批判的学术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和一般的怀疑古书古史是有本质区别的。学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辨伪是受了崔述《考信录》的影响,但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却忽略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伪和崔述辨别伪书的本质区别。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崔述相信经书即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所以整理的结果,他承认的史迹亦颇楚楚可观。但在我看来,终究是立脚不住的。”<sup>[4]</sup>(P59)顾颉刚认为,崔述的考信辨伪,就目的说是为了“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道王功”,其考辨则有确定的不可逾越的思想边界,经书不仅不能怀疑,而且是判定其他诸书是否可信的标尺。所以,崔述的考信辨伪还不能判定为真正的科学精神。而顾颉刚则不同。传统经书的权威性在他这里已经荡然无存,古史辨伪没有了任何不可逾越的思想边界。他冲破传统的经学藩篱,把一切古圣先贤的经典之作,都要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加以清理和考量。他提出的四个打破,每一个“打破”都是石破天惊之言,都有惊世骇俗之效,表明

<sup>①</sup>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不仅是一种新的古史观,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特点。胡适曾对此有所总结:“他的方法可以总括成下列方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胡适:《古史讨论读后感》,《古史辨》第一册,第192-193页)而这种可操作性,恰恰是古史辨能迅速发展为一个学术运动的重要原因。

他的怀疑古史,具有彻底性的品格,具有“革命的和批判的”近代学术精神,而与崔述之考信辨伪有了本质的区别。完全可以说,顾颉刚先生的疑古学说,高举的是一面以批判性为特征的近代学术旗帜。

怀疑与批判,是任何时期学术发展的精神依托,更是为今天所必须。或者说,正是今天中国的学术现状,要求我们要特别张扬古史辨运动的学术批判精神。当代中国学术,特别是中国的传统学术研究,或者说国学研究,几乎完全失去了学术的批判属性,其主流倾向变成了向传统的复归。人们对传统国学的推崇,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情感。毫不过分地说,当下的国学研究,已经窒息了传统学术的生命力,使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其根源,就是我们对待国学,只有阐释、敬仰而丧失了批判的兴趣和能力。这是一种特别可怕的趋势或走向。今年四月份《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就特别可怕,其思想倾向简直使人怀疑它是不是就是一种高级黑!文章写道:

……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公开而大胆地预言:未来最有资格和最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新文明的是中国,中国文明将一统世界。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人类的出路在于中国文明……

……“传统”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所“传承”的思想,是来自于全人类思想、文化汇聚之源泉,统一之本源,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本源文化,是天人合一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文载道、传道,最终的归属是引领人心合于道、归于光明本源,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华夏文明是本源的文明,故能亘古不变,所以,世界四大文明,只剩下华夏文明从未中断,绵延数千年。

……中国传统文化是引领人们超凡入圣。……<sup>①</sup>

把传统文化吹嘘到如此不恰当的地步,完全背离了中国文化求实、平实、自谦之美德。把中国文化说成

是要统一世界的文化,这将置其他民族文化于何地?这不是要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对立面吗?名为赞扬,实为诋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种文化喧嚣,就是典型的高级黑。

把中国文化说成是“成圣文化”,其精髓是“引领人们超凡入圣”,这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最大的梦呓,是中国文化的自我麻醉,是自欺欺人的思想欺骗。在今天仍然要宣传这些东西,并将此视为中国文化的精华或精髓,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扭曲和阉割!

这种毫无批判性的文化阐释,并不能真正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更不可能发挥推进当代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如果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去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我们就不会一味地在那里提倡和弘扬,就要去发掘、正视其理论缺陷。而正是正视其理论缺陷,才可能使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当代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事业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使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摒弃其落后或糟粕性的成分,并针对其先天性的理论缺陷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之优长。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也的确是有先天性的理论缺陷的。如果我们可以去发掘其理论缺陷的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理性自觉的话,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它的理论盲区并不是很难发现。譬如,儒学的这样几大理论盲区,就是无法回避的:

- 缺乏制衡绝对权力的理论
- 缺失阐发政治宽容的思想要素
- 不正视人的个体性问题
- 相信人性的善良

而这几个方面的缺失,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建设是极其致命的:

缺乏制衡绝对权力的理论和途径,就不能应对当代的民主制度建设;

缺失阐发政治宽容的思想要素,弱化了现代政治的必要张力,强化了政治的专制属性,就无助于建设具有包容度的现代政治;

不正视人的个体性问题,就无法应对

<sup>①</sup> 唐巍、韩同瑞:《中国传统文化,势必造福人类》,《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4月17日,第40版。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现代社会人的自由、平等问题；

相信人性的善良，就无法应对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紧迫性问题。

所以，儒家学说在应对当代社会政治建设的问题上，是力不从心的，一味地把当代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希望寄托在儒学身上，不是理性的选择，儒学并不具有复兴中国的精神力量。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理智的科学态度。批判性思维，是学术研究、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思维品质。而顾颉刚的“疑古”就体现着这样的思维素质和学术精神。

回到疑古史学的讨论上来，应该承认，疑古与信古体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学术精神。走出疑古的倡导者发挥冯友兰的“释古”说，定位走出疑古的学术方向为“真正进入释古时代”，把冯友兰的“信古、疑古、释古”学术研究三种态度说，变为史学研究或史学认识的三阶段、三时代说，而同时把“释古”变成毫无意义的概念。总起来说，从疑古走向质疑和批判，走向发展与创新，是学术生命力之所系；从信古走向盲目地遵从和复归，走向保守与偏执，只能是窒息学术的生命；释古的提法毫无建设性意义。所有的研究，不

管是疑古还是信古，都是一个“释”字，“释古”的提法，没有确定的指向性。

所以，在疑古、信古与释古之间，我们只能坚持“疑古”，特别是它所指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是我们要永远坚守的方向，这就是林运先生讲的：“走进疑古时代就很好，不用走出来的。”

参考文献：

- [1] 林运.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J].史学集刊,2007,(3).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李振宏.专题学术史研究的新成果——读蒋大椿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1994,(1).
- [4] 顾颉刚编.古史辨:第1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李振宏,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春梅

## 求真与批判:疑古史学的思想遗产

陈 峰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1992年李学勤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疑古史学的是非曲直又成为一个学术焦点。现在看来，“疑古时代”的说法尽管不一定确切，但疑古思潮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是中国历史学的一次革命。直至今日，疑古思潮、“古史辨”运动仍是古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仍关涉到对一系列古书、古史的基本判断。今天的古史研究要少走弯路，绕开陷阱，走出迷雾，必须正确

估价疑古思潮所遗留的遗产。对疑古思潮的回顾总结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比如上古史研究，文献学，史学理论，学术思想史等多个角度。这里主要着眼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分析疑古思潮的价值。

首先应当厘清与“疑古”相关的几个概念的关系。从冯友兰、周予同到李学勤等都将“疑古”、“信古”、“考古”、“释古”相提并论，或认作几个不同的派别，或视为几个相继的几个阶段，或看成几种并存的趋势，其实这几个概念并不在同一层面，不宜混合在一起。“疑古”与“信古”是一组对立的观念，“考古”